

樱花，樱花，  
春三月的晴空，  
一望无际；  
是云是霞？  
芳香无比，  
啊，赏樱去！

东邻日本的春天是十分秀丽的。樱花如绯红的浮云，朝霞把大地染红了，烧遍了。每当樱花一开放，人们就携男带女，争相前往欣赏这漫山遍野的樱花。自古以来，日本人民把她视为民族的象征，骄傲地称颂自己的国家是“樱花之国”。

樱花之国多娇艳，最艳的是奈良。这个座落在近畿中部的日本古都，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绿树丛中，点缀着名刹古庙，殿宇楼阁。她不但是日本历史上灿烂的奈良文化的发祥地，日本人民“心中的故乡”，而且也是凝聚着中日人民友谊的历史名城。倘若你去游览奈良，热情的奈良人民，一定会指点你参观那些雄伟、庄严的古建筑，精致细腻的古艺术遗品；向你叙说为缔结中日友谊，交流科学、文化、艺术，无数先辈不畏险阻，克服重重困难，远涉重洋的动人故事。其中，他们还会特别介绍你参观唐招提寺，

讲述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布唐代文化的不朽业绩。

鉴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东渡日本？又是怎样克服艰难险阻，实现东航的宏愿的？他究竟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不朽的贡献？现在，让我们翻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史，追忆一千二百多年前，鉴真和尚和日本人民一起，播下中日友谊种子的业绩吧！

## 一、钻研佛学

公元六八八年中的某一天，在长江北岸，大运河流贯的广陵江阳县，即今天扬州市，一个姓淳于的商人家庭，诞生了一位眉目清秀的男孩，他就是鉴真。

鉴真的出生地扬州，是一座景色秀丽的城市。

绿油春水木兰舟，  
步步亭台邀逗留。  
十里画图新阆苑，  
二分明月旧扬州。

当时四方文人学士前来赏游，都被扬州美景所陶醉。他们吟诗题词，留下了大量赞赏扬州风貌的诗句。

扬州令人向往和留连的，不单是她的风景，更主要是它的繁华和富庶。“江淮之间 广陵大镇 富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在唐代，除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外，全国最繁华之处，要数扬州和成都了。扬州西望洛阳、长安，东下长江，可出海远航日本、南洋，是唐王朝统治江南各地和内外贸易的重镇。史书就有“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赋出天下而江淮居十九”的记载。

“商胡离别下扬州”。扬州的繁荣，也吸引了大批国际贸易商人。不少阿拉伯、伊朗、印度和日本的商人，会聚

扬州，平等贸易，互通有无，使繁华的扬州显得格外热闹。

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手工艺技术的发展。扬州出产的锦，驰名国内外。扬州造的大船，经得起波斯湾的险风恶浪。八世纪时，日本工匠就很钦佩扬州工匠的技艺。在日本的史书《续日本纪》上，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日本的丹波国（今京都地区）有一座华浪山，山上有一种矿石，一个名叫昆解宫成的工匠，常用这种矿石，铸炼成各种器物。有一次，他铸了一面镜子，呈送给天皇。天皇见了十分高兴，认为这种矿物不亚于唐朝的锡。于是又让昆解宫成率人上山，广泛采集，并召集各铸工和宫成一起铸炼。铸工们都认不出这究竟是什么矿，有的说是铅，有的说是白镞，大家争论不休，久久不能断论。后来，一位遣唐使团的官员，把这种矿物的铸成品带到扬州，请扬州铸工鉴定。扬州铸工拿过来一看，马上肯定地回答说这是纯镞（一种锡和铅的合金）。扬州铸工的正确判断，结束了日本铸工们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鉴真就在这繁华而又开放的城市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他的父亲以经商为生，但在思想上，笃信佛教，曾受戒学禅。家庭对鉴真的影响是极深的。虽然富裕的家庭为他攻读诗文和日后步入仕途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他厌弃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却对父亲虔诚膜拜的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向往那清静简朴的僧侣生活。

七〇二年，也就是鉴真十四岁的那年，他随父亲前往大云寺朝圣。那郁郁青松、奇石叠山、梅竹相杂的幽雅清静的环境，青松翠竹围绕着的巍峨的殿堂，清脆的梵钟，渗

心的檀香，温娴微笑的佛像，都强烈地吸引着他，激励着他。他鼓起了勇气，向父亲倾诉了久久隐埋在心中的志愿，要求父亲同意他出家为僧。父亲不仅没有呵斥儿子，相反，却认为“这样年岁的孩子，要求出家，这是有佛缘呀”，也就欣然同意了鉴真的要求。大云寺的禅师智满，与鉴真的父亲过往甚密，当然很高兴地收留了这位少年信徒。入寺不久，便在智满禅师的主持下，剃发为沙弥，开始了佛学研究的生涯。

大云寺是在六九一年，鉴真三岁的时候兴建的。那时，武则天登位掌权，大兴佛法，号令全国四百余州，每州建立一座官立寺院。扬州因地处南北枢纽，又是朝廷遥控江南的要地，诸事备受重视，大云寺也不例外。武则天曾发布诏令，“天下诸州度僧，便就智满禅师”。可见，鉴真出家时，扬州大云寺和他的师父智满，早已名扬全国了。在名师的指导下，鉴真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在佛经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佛教徒看来，一个人出家，并不意味着他已成为合格的僧侣。要成为真正合格的僧侣，必须经过较长岁月的修行。得道者由名师主持授戒仪式后，才能步入正式僧侣的行列。佛教的授戒仪式有两种：一种是“菩萨戒”，它表明受戒者，已经具备了作为僧侣的基本条件；另一种是“具足戒”，它表明受戒者，在佛学的研究上，已达到了精深的程度。鉴真从出家到受“菩萨戒”和“具足戒”前后经过了七年时间。七〇五年，他离开生活了四年的大云寺，拜越州龙兴寺道岸和尚学戒律，并受“菩萨戒”。又过了两年，

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进行了一次在他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旅行。他千里迢迢地来到洛阳，七〇八年又到了长安。三月二十八日，在长安实际寺，由著名的律宗法师弘景和尚主持，给鉴真举行了授“具足戒”的仪式。参加这一仪式的还有道岸、法藏等十余位名师。这充分表明，他们相当器重这位在佛学研究中初露锋芒的、年仅二十岁的青年。此后数年间，鉴真往来于洛阳、长安之间。

洛阳和长安的建设，比之扬州自有特色：全城布局严整可观，气象宏伟；街坊结构划一，布列匀称；街道纵横交叉，齐整笔直。道旁“迢迢青槐树”，“千条弱柳垂青锁”，鳞次栉比的店铺和手工作坊。景色的诱人和城市的豪华对鉴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所关心的是巡游寺刹，寻师访友，孜孜不倦地探求佛学中的各种知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七年的努力，鉴真终于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僧侣。这是他在洛阳和长安所取得的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就是他对东邻日本有了一定的了解。隋唐时期，日本正处于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阶段，新兴的日本封建主急于要从中国吸取一套封建制的统治方式，于是有计划地经常派遣使臣和留学生来中国访问、学习。据统计，日本留唐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是僧侣。他们大多数居留洛阳和长安，广泛结交，和中国僧侣切磋经典，探讨学问。鉴真在洛阳和长安钻研进修期间，就有不少日本僧侣也在两京居留。其中也有学业优秀者，如辨正和尚，善围棋，屡受唐玄宗李隆基之约，进宫对弈。又知道慈和尚，和鉴真一样，涉览经典，尤精三论，归国以后，名盛

全国，积极鼓吹要按照唐朝的传教法则来整顿日本的佛教界。鉴真在洛阳和长安期间，听到的有关中日之间佛教交流的传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听说，在很早以前，我国有一个名叫惠思的和尚，寂化后，转生到了日本国，成为王子。王子笃信佛祖，大力推广佛教，普济众生，遂使佛法在日本日渐兴隆。这个传说，当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中日人民友好的愿望。他还听说，日本国有一位大臣叫长屋王，善汉诗，信佛教，曾制作袈裟一千件，每件绣有四句偈诗：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  
共结来缘。

并托人把袈裟带到唐朝，分赠给当时著名的我国僧侣。这些友好的传说和故事，激起了年轻的鉴真的无限感慨，他说：“以此思量（日本）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啊”。这大概是后来他欣然应邀东渡的思想基础之一吧。

七一三年，二十六岁的鉴真，满载着丰硕的学术成果，返回扬州。此后数十年，他在江淮一带，建寺造佛，传教讲学，遇河架桥，见病施药，深得僧侣和人民的尊敬。他的弟子多达四万余人，其中著名的就有二百三十多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以戒律化诱，郁有一方宗旨”。鉴真成了德高望重、名扬四方的高僧。

## 二、应邀访日

鉴真生活的时期正是我国盛唐时代。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国力的强盛和对外交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那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友好的，彼此的交往是很密切的。中日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友好关系，其实在隋代就已开始了。

五九三年，圣德太子辅佐推古天皇，执掌国政。他是一位热心于社会变革的人。他根据日本社会的实际需要，积极地推进中日文化交流，带头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文物制度。六〇〇年他亲自派使者到隋朝联系通好。据《隋书》记载，使者一到隋都，隋文帝杨坚就接见了。使者向隋朝有关官吏通报了日本的国情，使中国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六〇四年圣德太子吸收了从中国传过去的儒、佛、法诸家思想，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改革的第三年，他又派遣大抵官位小野妹子为国使携带国书前来中国隋朝建立国交关系。国书中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词句，反映了圣德太子致力于发展同中国之间的对等关系的外交方针。六〇八年四月，隋炀帝杨广特遣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专程陪送小野大使返日。八月三日，日本朝廷“设仪仗，鸣鼓角”隆重相迎。裴世清

呈递了隋炀帝致推古女皇的国书，其中写道：“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欸之美，朕有嘉焉”。明确表示同意中日建立国交关系。裴世清归国时，天皇和圣德太子又派小野妹子为大使，专程送回中国，这次随同赴隋的，还有八名到中国学习的第一批留学生和学问僧。

进入唐代以后，两国之间的往来更趋频繁。当时，日本正处在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阶段，皇室和一批先进知识者对封建的唐代文化非常钦佩和羡慕。他们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热切地要求与唐代中国建立长期的亲善关系。

六四五年，日本实行“大化革新”，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两国使节、学者、学生络绎不绝，中日关系更加密切。

当时，日本朝廷为加深和巩固两国的睦邻关系，交流珍贵物产和文化，常派遣国使——遣唐使前来我国。据史书所载，曾先后派遣使节十九次，其中两次未能成行，一次是专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的“迎入唐使使”，三次是陪送唐朝赴日使节回国而派遣的“送唐客使”。因此，日本正式派遣使节来唐朝专门从事外交活动共十三次。遣唐使团的规模，开始时，每次一两船，每船约一百二、三十人。到了八世纪以后，每次四船，总人数多达五六百人，组织也比较完备。成员中有团长和官员，是代表政府的使节，分别称持节使、押使、大使、副使、判官和录事。工作人员中有制造、维修船只的造船都匠和船匠；有负责旅途安全

和健康的射手和医生；有翻译和书记；有活跃海上文化生活的音声长和音声生；还有舵师、水手长、水手、画师、玉生、铸生、细工生等。

日本朝廷除派遣大型遣唐使团外，还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他们多是风华正茂、求知欲旺盛的青年。一到我国，虚心求学，拜师觅友，刻苦钻研。许多人在中国留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他们不但学业上刻苦，而且生活俭朴，把唐朝朝廷给他们的生活费用，节省下来购买大批书籍，“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九世纪末叶时，日本作过一次调查，查明当时日本收藏我国的典籍达一千五百七十九部，共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学问僧带回去的。

八世纪时，日本人民在广泛而大量地吸取唐代文化，深入而细心地总结日本国固有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奈良文化。从奈良文化的各个领域，我们既可以看到唐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可以看到日本人民消化外来文化，并使之适应本国国情的惊人的聪明才智。

在奈良文化的百花园里，佛教文化尤为鲜艳。宗教本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时代的思想、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常常会围绕着宗教而体现出来，因而也随着宗教的传播而传播开来。

佛教最早流行于印度，后传入中国。六世纪，又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大化革新后，日本就直接从中国输入

佛教文化。许多日本僧侣冒鲸波之险到中国来学习，同中国僧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日僧道昭和尙，曾于六五三年随遣唐使到长安，拜玄奘为师。玄奘十分高兴地收留了道昭，并让他同自己住在一个房间里，朝夕相处，共探经文。玄奘对道昭说：“我到西域取经的时候，有一次在途中，前不见村，后不着店，肚子又饿，口又渴。正在为难的时候，忽见一位沙门，手持鲜梨热情地送给我。我吃了鲜梨，顿觉气壮身健。现在，你就是手持鲜梨的沙门，你来了，使我有机会了解你们国家的佛学情况了。”这一席话，既反映了玄奘的谦虚，也反映了他对邻国僧侣的欢迎。道昭随遣唐使回国的时候，玄奘送他两件东西，一件是自己抄译的舍利经论，另一件是一个煎药熬水的铛子。临别时，玄奘握着道昭的手说：这药铛子是我从西域带回来的，煎物养病，无不神验，你带上它，自有用处。道昭感动得热泪盈眶。道昭一行到了登州，遣唐使团中有不少人病了，他就用玄奘送的药铛子熬水煮粥，分别送给病人吃，病果然很快就好了。据传说，道昭乘坐的船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可是总到不了日本海岸。大家心里很纳闷：风是顺风，为什么船总不前进呢？船上有一个会占卜的人占了一卜，说是因为海龙王要玄奘的药铛子。道昭听了拒不答应，他说：这药铛子是我的师父给的，龙王怎么敢要！船上人七嘴八舌地说：你不给药铛子，我们就没命啦！都要沉海喂鱼呀！在大家的动员、威逼下，道昭只得忍心把药铛子抛入海中，结果船很快就靠岸了。这一段海龙王要玄奘的药铛子的事，当然是好事者编出来的神话，但它却十分生动地说明

了中日之间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宗教界的交往是有悠久历史的。

奈良时期，佛教被封建朝廷推崇为国家的主要统治思想之一。七四一年二月，天皇仿效隋大云寺、唐开元寺之制，号令全国普遍建造金光明四天王寺、法华灭罪寺。七四三年，又仿效武则天在洛阳营建大佛，也在东大寺铸造高十六米、重五百吨的卢舍那铜佛像。七四九年，朝廷又正式向寺院颁赐土地和封户，致使佛教相当兴盛。日本统治者所以支持佛教并带头信奉，其主要原因在于，佛教是维护统治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它的幻想力比其它宗教高超得多，迷人的方法也巧妙得多。统治者利用佛教来欺骗人民，让他们顺从和忍耐剥削和压迫，安心于贫困生活，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但是，现实的发展，并不是按照统治者所希望的那样进行的。同他们的意愿相反，人民常常利用宗教的合法性，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据日本史书记载，在八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农民们或集聚山地，或会合海岛，“妄说祸福”；“妖言惑众”进而也有发展为“盗贼”的。这种以信奉神佛为名的群众性集结，“多则万人，少乃数千”；还有不少农民，不忍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纷纷逃入寺院，剃发为僧。因为法律规定，僧侣是可以免税免租的。另一方面，七世纪初叶，上层僧侣凭借着朝廷的威势，为所欲为，有的甚至逐渐发展为不念佛经，不住寺院，专营私利，专养妻室。所有这些情况，颇使奈良朝廷焦虑，曾采取各种办法，对寺院和僧侣进行整顿。六八四年，施行

僧纲制，设立最高佛教行政机关，任命僧正、僧都、律师三级僧官，具体管理僧侣事务，包括整肃僧侣的风纪。七二〇年，为防止农民剃度（佛家语，意剃发为僧），宣布实行“僧尼公验”制，规定每一个僧侣必须持有朝廷发给的凭证，不持凭证者为非法僧尼。朝廷实行的种种整顿僧尼的措施，虽能暂时地起一些作用，但仍然不能制止农民的流亡和上层僧侣的腐化堕落。正在这时，奈良朝廷获知，在唐朝佛教界中推行的戒律思想和授戒制度，对纠正日本佛教僧侣中的上述弊病，是很有用处的。“戒律”是防止佛徒胡作非为的佛教戒规。律宗推行的授戒制度严格规定，每个僧侣要取得合法的地位，都必须接受名师的授戒。举行授戒仪式时，需有十位名师在场，其中三位是授戒师，七位是临场的证人（称“三师七证”）这就是说，十位僧侣可以证明一名僧侣的合法性。十位僧侣的名声越大，地位越高，也就表明受戒者的学问越深。奈良朝廷觉得，这种作法既可以控制僧侣人数的盲目增多，又可以抑止僧侣的违法行为，并借以提高僧侣的学问，更有效地为巩固王朝的统治服务。于是，便积极地派遣学问僧前往唐朝，一边学习戒律思想和授戒方法，一边物色唐朝的著名法师，邀请他们到日本去传播戒律。

七三二年八月，在奈良朝廷任命第九次遣唐使节的前后，当时担任律师职务的隆尊和尚，曾要求朝廷派遣两名僧侣随使团遣唐，学戒律，请高师。他说：我素性顽愚，知识浅薄，担任律师，实在名不符实，难以完成圣上委托。我一直想赴唐深造，但一则因为“缺乏才力”，二则因身任

律师，不便于出访求学，所以一直未能如愿。他向朝廷竭力推荐两位有为的青年僧侣赴唐。一位叫荣睿，一位叫普照。他特别称赞荣睿，说他机捷神睿，有辩论之才，年纪虽轻，但“常患戒律不完备，始有跨海学唐朝之志”。隆尊和尚的推荐，很快获得了朝廷的批准。

七三三年四月，荣睿和普照随遣唐使多诒比广成率领的使节团，从难波津（大阪）出发，前来中国。由于途中遭风暴，直至八月才达苏州。七三四年四月进入洛阳。当时唐玄宗正在洛阳，大使和荣睿、普照等人受到了接见。此后九年间，荣睿和普照经常往来于洛阳和长安之间，一边学习戒律，一边拜谒名僧，邀请他们东渡日本。期间，他们成功地邀请了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璿、印度僧婆罗门菩提等人东渡。

七四二年，即荣睿和普照在中国生活的第九个年头，他们两人打算结束留学生活，及早归国。可是考虑到还没有邀请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朝廷的使命尚未完成，倘若空手归国，着实不好交待。两人互相勉励说：“必须抓紧时间，不要空度时光，积极邀请名师一同归国”。经过努力，他们先后邀请了长安安国寺的道杭和澄观、洛阳的德清和正在长安的高丽国僧侣如海等人。

唐代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私人是不能出国的，因此，唐僧私渡日本是违犯国法的行为。若要顺利地达到预期目的，必须设法取得唐朝官方的允许。正好道杭和尚曾是唐朝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的家僧。荣睿、普照经道杭的介绍，会见了李林宗。荣睿向李林宗陈述了自己的打

算，并要求李林宗予以协助。李林宗是笃信佛教之徒，当然不会反对僧侣去日本传教，可是，办理允许唐僧出国的正式证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他们商定了一个通便的办法，即办一张从扬州出发，经海路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朝圣的证件，出海后如若顺风，马上直航日本，如若风向不顺，则前往天台山再作计议。关于航海船只问题，李林宗答应捎信给在扬州担任“仓曹”官职的侄儿李湊，让他帮助办理。

盛秋时节，荣睿、普照、道杭、澄观、德清、如海以及另外两名日本留学僧玄朗、玄法，带着李林宗给李湊的亲笔信和到天台山朝圣的证件，离开长安，经洛阳向扬州进发。

### 三、立志东渡

荣睿、普照、道杭等人，到达扬州，正是菊茂花香的十月。他们拜访了扬州仓曹李湊，呈递了李林宗的亲笔信函。李湊妥善安置了荣睿一行，并满口答应将按照李林宗的吩咐，造船备粮。

道杭是鉴真的弟子，今日到达扬州，并即将离开祖国，一种师徒之间的亲密感情，使他立刻想去看望师父。一俊造船备粮有了着落，他便去看望鉴真。听说道杭去探望名师鉴真和尚，荣睿、普照也要一同前往。早在洛阳和长安的时候，他们就已耳闻鉴真的大名。他们也曾暗自想过，要是能邀请鉴真这样的大师去日本，那多好啊！今日来到鉴真所在的扬州，而且又有道杭的引见，这个良好机会，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失去的。

这时，鉴真住在大明寺，即现在的法净寺。

大明寺是扬州最著名的古刹，相传建于南北朝的宋孝武帝时期（457—464）。佛寺巍巍庄严，寺内有九层佛塔，挺拔云霄。攀登顶层，可目穷千里，弯弯运河，滚滚长江，绿茵丛中的繁华市景，尽收眼底。寺内还有古井清泉，甘冽明洁，有“天下第五泉”之称。气势雄伟的佛塔，甘香清冽的泉水，曾激发无数才气横溢的诗人们的诗兴，写下了

不少隽永的诗篇和记叙。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和白居易就曾携手同登大明寺佛塔，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

步步相携不觉难，  
九层云外倚阑干。  
忽闻笑语半天上，  
无限游人举眼看。

半月悠悠在广陵，  
何楼何塔不同登。  
共怜筋力犹堪任，  
上到栖灵第九层。

这一天，道杭偕同荣睿、普照、玄朗、玄法等人，来到名闻全国的大明寺。鉴真见了道杭、荣睿、普照等人，格外高兴。荣睿、普照等人真诚拜谒，叙述早闻师父大名，有志拜见，领请教诲，今日相见，实为今生有幸。谈话间，鉴真详细地询问了日本的国情和佛教弘布情况。荣睿和普照详尽地作了回答，他们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他们乘此机会，表露了邀请鉴真东去日本的想法，说：“为使日本国佛教的兴盛，殷切地希望大师父东游兴化。”听了荣睿和普照的邀请，鉴真和蔼地对在身旁的众弟子说：“以前我听说过惠思和尚转生日本的故事，还听说过日本国大臣长屋王制袈裟，绣偈诗送来中国的事情。‘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语佛子，共结来缘’。看来，中日两国确实确实是佛法兴隆的有缘之国。今天，荣睿法师、普照法师向我们发出邀请，你们之中，有谁愿意